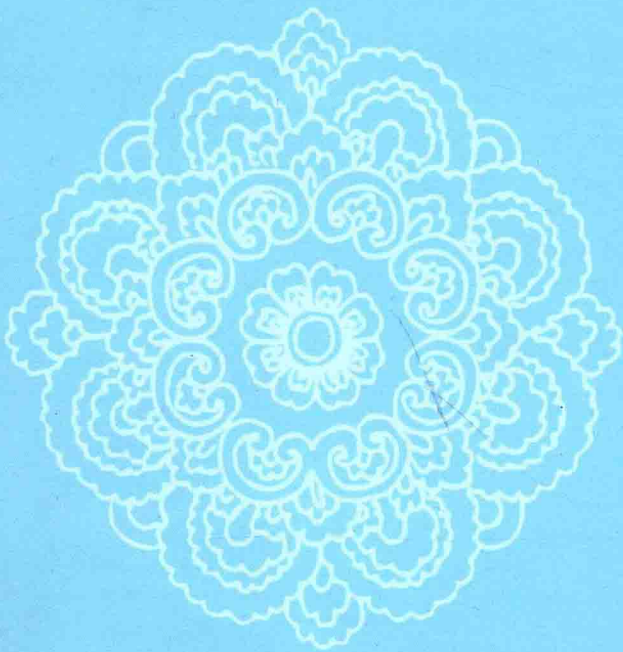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丛刊

2013年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黄霖
陈广宏
郑利华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丛刊

2013年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黄霖
陈广宏
郑利华

主编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3年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黄霖, 陈广宏, 郑利华主编.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506-2314-9

I. ①2… II. ①黄… ②陈… ③郑…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明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9456号

- 书 名 2013年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黄霖 陈广宏 郑利华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211523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70
字 数 1617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2314-9
定 价 15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25-57572508)

目 录

谈《明代文学思想史》的建构	陶慕宁(1)
明代文学史叙述的新视角	
——《剑桥中国文学史》明代部分评述	魏崇新 张洪波(5)
明代诗文中雅俗两大思潮的互动与消长	陈书录(13)
明代道教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余来明(33)
明代文人插花书与日本花道发展之关系	顾春芳(39)
由流行读物到文化经典再到戏化语料	
——论“谢枋得解《千家诗》”在明代的流行	查屏球(45)
宋元经义与明代八股文源流关系辨微	刘尊举(67)
《心史》对明遗民的巨大影响	陈富康(82)
论明代词选的编排体例及其功能	张仲谋(89)
关于明词研究新体系之建构前提的思考	叶 晔(99)
台阁体审美范畴释论	
——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何宗美(110)
纪实·虚构·复制:明清群体画像文本的三重观看与近世化趋向	毛文芳(132)
明清琉球册封海途上的钓鱼岛文学书写	罗时进 姜 鹏(158)
元末明初东南文坛格局论略	饶龙隼(169)
明初文学中的乐境建构	张德建(182)
杨维祜传世最晚墨迹考论	
——兼及其名字、生年之确定	孙小力(194)
宋濂朱学渊源考	宋克夫 熊恺妮(204)
20 世纪刘基与浙东诗派研究	左东岭(212)
王祎·凤林王氏·华川书舍·青岩	徐永明(226)
卓敬事实辨疑	赵素文(238)
模拟·正名·变音	
——丘濬《贪泉对》之山水系谱及其世变论述	许东海(247)
茶陵诗派的文学史地位及评价	林家骊(261)
论朱谏《李诗辨疑》与明代宗唐疑古风尚	黄伟豪(269)
唐寅佛禅诗探析	蔚 然(280)
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前七子的崛起	薛 泉(287)
李梦阳、何景明复古理论与创作的高下得失	吴志达(300)

李梦阳批判明正德帝作品之脱中世的性格

——通过乐府和歌行体诗 元钟礼(307)

丽江木公与杨慎的文字交往及其诗集的刻印收藏 孙秋克(314)

杨慎曾珩交游考 杨 钊(319)

唐宋派与中国文格的位移 罗书华(326)

唐顺之《任光禄竹溪记》所记主人考论 纪玲妹(332)

论唐顺之的儒家文艺思想的发展

——兼论其文学思想与王畿心学的关系 杨遇青(338)

论唐顺之的人格精神与晚岁出山抗倭 邵金金(348)

王世贞与杨慎 雷 磊(356)

明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脛谈

——以王世贞“真诗”说为视角 魏宏远(366)

张佳胤王世贞交游考 李 新(377)

明嘉靖无锡华氏家族及其文学圈属述略 查清华 王 洪(383)

“诗性生活”与“市隐心态”

——明代中后期苏州文人心态与创作 严 明(396)

闽南与蓟北

——郭造卿的游幕生涯与其文史成就 朱丽霞(402)

胡应麟与汪道昆交游考述 韩 晓(422)

末世狂欢:晚明文学与非主流文化论纲 欧明俊(430)

论晚明小品文的艺术品性 陈国安(440)

中国东南一群诗人的千秋事业

——晚明漳州诗人组织霞中社及其群体意识的觉醒 陈庆元(451)

论晚明兴起的“《雁字》诗热”

——兼论公安派后期诗风的转变与影响 黄仁生(462)

论竟陵派对诗歌情理的辨识与批评 曾 肖(476)

王彦泓诗论

——兼及文学史研究的观念问题 耿传友(483)

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再探 许建昆(501)

欲识玄玄公案,黄粱未熟以前:从《谷响集》看明季滇僧彻庸周理的思想

渊源与精神境界 廖肇亨(512)

从《王介人集》论王翊诗歌 周兴陆(526)

一代红妆照汗青

——秦淮风月与青楼书写 李栩钰(534)

吴梅村的政治参与及其诗史之形成 陈岸峰(546)

《日知录》“试文格式”笺证 李光摩(569)

余怀与妓女

——从初期作品到《板桥杂记》的作品变貌 小冢由博(583)

由《跳月记》读明清文人西南书写的情感叙事	胡晓真(592)
论王夫之对明代七子派的接受	史小军(599)
《明词综》编纂考	陈水云(610)
略论汪端《明三十家诗选》的编选特色	黎必信(614)
朝鲜出版本中国古典小说之书志学考察	闵宽东(625)
“传奇”文体名义的演变	徐大军(646)
通俗小说:明代儒学平民化与世俗化思潮的重要载体	陈才训(659)
明代小说与词曲发展史研究的新视阈	
——明代小说寄生词曲辑纂启示录	赵义山(671)
明代教育小说演变初探	李延年 孙天任(681)
明代戏剧中的佳人才子故事、演化及其他	苏建新(700)
论明清文人小说的“整一性”	何 萃 解玉峰(713)
明清历史小说与说唱艺术的关系	田村彩子(723)
“王月英”“梁祝”“秦雪梅”里的三世姻缘及其流传	
——以湖南唱本为中心	岩田和子(731)
明清小说中的倭寇叙事	万晴川(741)
章回小说补书初探	傅承洲(752)
试论明清章回小说对朝鲜半岛汉文长篇小说的影响	聂付生(760)
明清闽籍文言小说作家作品研究	陈丽媛(770)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沈伯俊(779)
周日校刊《三国志演义》插图考察	中川谕(788)
百年《三国演义》虚实之争的学术走向	郑铁生(798)
《三国志演义》之行文“重复”及其叙事功能	李桂奎(811)
《水浒传》刘兴我本和藜光堂本数字化研究	周文业(825)
“天书”传说:《阴符经》对《水浒传》的影响	郭皓政(878)
秣陵金在衡刊《西厢记》:一个重要的明善本	杨绪容(892)
《皇明英烈传》与明初功臣“太祖十二英”	
——从国家祭祀到通俗文学	川浩二(899)
再议《西游记》与心学	张蕊青(907)
浅谈世德堂本《西游记》常见的校注问题	李天飞(913)
本土文化与佛教的矛盾:人文视野下《西游记》中猪八戒和牛魔王家族	
命运解读	陈国学(923)
金陵书坊唐氏世德堂主人考	
——两位“唐光禄”	上原究一(928)
李云翔生平事迹辑考及《封神演义》诸问题的新认识	周明初(94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金瓶梅词话》读后	黄 霖(958)
江户时代被当作“资料”究读的《金瓶梅》	
——从高阶正罢所施训注谈起	川岛优子(965)

《金瓶梅》文化价值论	许建平(977)
明代社会的风俗画卷	
——《金瓶梅词话》中的赋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雷 勇 苏 腾(989)
《金瓶梅词话》对明代文言小说的仿拟及其他	
——以《贾云华还魂记》为中心	杨 彬(997)
《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的插图与其出版背景	松浦智子(1006)
“小说家”视域下《说类》性质初探	刘天振(1018)
《警世通言》版本新考	大冢秀高(1032)
吸纳与烘染:互文性视域下的拟话本帝王故事	陈炜舜(1050)
凌濛初评点《世说新语》的文化义蕴初探	郑幸雅(1074)
明末文言小说中的创作观念	
——以《九籥集》为中心	上原德子(1082)
明末孟称舜戏曲评点之删修状态研究	王祥颖(1092)
补天石·镜子·颜色	
——试论《西游补》与《红楼梦》的象征意象	赵红娟(1104)

谈《明代文学思想史》的建构

陶慕宁

一、论从史出,下笔矜慎

继《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相继问世,罗宗强教授又穷十二年之功,完成《明代文学思想史》,从而在他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的建构中树立了一座坚实的大厦。明代文学流派纷呈,诸体兼备,而向无统摄全体的思想史。以往的文学史著,论及明代,或囿于传统,无视小说戏曲,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或趋附政治,以所谓“人民性”、“阶级性”为准的,贬诗文而过崇说部戏曲,如1949年后行世的多部文学史。1980年代以来,情况颇有改观,出现了多种有深度,有见识的明代文学研究专著,或文体专史,或专人研究,或流派研究,或地域研究,或理论探索,但时至2012年,仍未见条贯历朝、汇通诸体的明代文学思想史,故罗宗强教授此书实有填补空白,别开生面的学术价值。

所谓文学思想,窃以为应系由某一人或若干志同道合之人提出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审美的主张,很快得到多数文人的响应,逐渐形成一种思潮,终至对此前的文学创作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且有相当的持续时间。在特定的时期,亦容有数种文学思想并存,互相攻讦,势同水火的局面出现。明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如同政局的多变无序,文学创作也呈现出品类繁夥,雅俗交争,高下杂处,乱象纷纭的局面,要想在如此繁复多变的文学现象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文学思想衍化的脉络,没有大量的文献材料的爬罗甄别,没有高屋建瓴的理论素养,没有清晰缜密的思辨统摄,很容易目迷五色,治丝益棼。著者在“后记”中说“大量的精力,还是耗在了材料的阅读上。即以别集为例,不读不放心,读了与研究题目有关的十不得一。十个别集有九个属于白读。……当然,经过大量的阅读,对于明代文学思潮发展的环境氛围,还是有一个感性的认知,还是有益的。”^①实际上,无论是写文学史还是写思想史,客观的立场固然重要,然而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趣味风尚有“了解之同情”,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我想,著者所说的“感性的认知”即是此意。

《明代文学思想史》的建构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即通过政治环境、社会风习、文人心态的

^① 罗宗强著《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3年1月,第889页。以下引用此书只标页数。

反对模拟,重创新,重自成一家。这就很清楚地揭示了文学思想的复杂性,而更加接近文学历史的真相。

互动,考察揭橥近三百年中每一种文学思想的萌生、发展、嬗替的历程,结合创作实绩,指明该种文学思想的内涵、指涉以及对文坛的实际影响。譬如在论及洪武一朝至台阁体独擅胜场的明前期文学思潮时,就既注意到明初大一统政教的干预,又具体分析了彼时士大夫文人的心态特点,论证了复古尊经思想与典雅雍容诗风形成的必然性,同时又能注意到具体作家微小的差别性,如论宋濂,一面指出他在重道崇理方面与彼时文学思想的一致性,一面又提出:“但是,宋濂的文学观念其实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的文学观念,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从此一根底上他又生发开来,从三个方面丰富了宗经的观念。一是虽宗经,而重实用。一是虽宗经而强调气之重要。一是由宗经而复古,但复古又反对模拟,重创新,重自成一家。

《明代文学思想史》的又一个特点是不蹈袭成说而自成机杼,已往的许多论著,涉及明代的主情尚真文学思潮,几乎众口一词,称扬不已,从徐渭、汤显祖、李贽到公安三袁,看重的是他们观念的“同”,而很少发掘其间的“异”,而且也并未真正梳理出“主情思潮”从萌生到发展、衍化的清晰线索。罗著则从大量的别集文献入手,结合具体文人群落的创作活动,爬梳出一条从弘治前后沈周、桑悦、祝允明、文征明、唐寅……陈淳、陆粲到正嘉之间的杨慎再到嘉、隆、万之际的徐渭以迄冯梦祯、王稚登、屠隆、潘之恒、莫是龙、梁辰渔直到万历中期的汤显祖、李贽、公安三袁的“重个性、重真情、重自然”的思想发展脉络。而且进一步提出“明代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性其情’与‘情其性’两种不同的抒情观。‘性其情’指以理约束情;‘情其性’指情摆脱理的约束”^①。这就揭示了明中叶以后重情文学思潮本来就具有的复杂性。这种经由擘肌析理、冥搜殫擷的研究之后得出的见解显然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当然也更有说服力,更具学术价值。

当前的学术体制几乎将一切研究纳入项目、课题,三至五年必须完成。急功近利的导向使多数学人对研究对象难以做到沉潜含茹、从容周密,以致平庸冗沓之作篇帙腾涌。纵有少数研者,亦多为嫫者所掩。以十二年之功写一本专著,非有过人定力,盖实难为。然而也正是这十二年的细读,使作者能够贴近古人,从大量的别集笔记、诗文词曲中剔抉出或显或隐的文学思想。复由于著者对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思想都有深湛的研究,故每每能够披源溯流,从具体的概念引入讨论,指出其源自何处,内涵与外延,能指与所指,再结合创作实绩,分析其得失。如在第九章论王慎中、赵时春与唐顺之时,先是扼要点明此数人思想的复杂性,“有程、朱,有阳明,有庄、禅”。而后在论及他们共同的观念——“喜怒哀乐由心而起,不由物生”时,指出“此一种之思想,有其源头,唐人骆宾王与唐太宗都有类似之表述”。而后引唐太宗《贞观政要·礼乐》与骆宾王《伤诸阿王明府序》有关心物之论,以证其渊源有自。最后说明“若要进而追究此一思想之理论渊源,则似可追至嵇康之《声无哀乐论》。……我们都知道嵇康的理论产生于重视自我的时代。他之强调内心在心物交感中的重要性,乃是那个重个性时代的产物。他的理论基础,是玄学,是老、庄。唐顺之与赵时春之所以重视心在心物交感中的主导地位,是心学的影响”^②。这样的结论给人以沉实厚重之感,令人信从,原因就在于“通”——通透、通贯、通达,不矫饰、不沾滞、不盲从。

① 第846页。

② 参第391、392页。

二、崇实尚质, 僾论纵横

明代的通俗文学, 白话小说、戏曲、民歌是重镇, 成就远在诗文之上,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亦汗牛充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明代诗文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 俨然呈显学之势, 且通俗文学研究分庭而抗礼。但时至今日, 治俗文学的学者与治诗文的学者似仍各守一隅, 未打破雅俗的固有畛域。谈明代的文学思想, 自然不能厚此薄彼, 更不能置一端于不顾。罗著将小说、戏曲与诗文冶为一炉, 开创性的建构了明代文学思想史的框架。所谓开创性, 不单单是指将小说戏曲都包容在一部书里, 如果仅仅如此, 而后各说各话, 那就不过是雅俗并列, 各表一枝而已, 谈不上开创。罗著的创新性在于提出并且论证了雅俗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其论《剪灯余话》, 已注意到台阁文学思想的渗透。其后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嘉靖间侵板发行, 即提出:

嘉靖前后文学思想正在缓慢地发生变化, 文学思潮逐渐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此时既有文学复古思潮兴起; 江南一带, 又有重抒情的文学创作倾向的出现。而市民社会的文化生活也逐渐地影响着士人的趣味。商业繁荣, 正在改变着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趣味, 阅读的娱乐化成为市民社会之一文化内容。……嘉靖(或者前至弘治)《演义》刊行, 得以广泛传播。而且, 自此以后, 一版再版, 在再版的过程中不断通俗化, 读者群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市井细民。此一种娱乐化的阅读, 也影响着士人阶层, 改变着士人的审美趣味, 影响着士人家庭^①。

这种表述虽似平淡, 却是基于对嘉靖朝整个文坛深入探索之后的论断。又如论李开先, 则从其仕履学殖心态入手, 论及其诗歌之简淡浅俗、自然随性, 进而探讨其戏曲理论之“本色”说。最后指出“浅俗观念之进入李开先的‘本色’范畴, 与其时开始出现崇尚浅俗的文学思潮有关”^②。这就既关注到个人文学思想的独特性, 又把握到时代思潮对个人文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力。

著者在“结束语”中总结明代文学思想最重要的三个问题是: 一、复古思潮; 二、抒情理论; 三、文学思潮与政局的关系。这确是切中明代文学思想发展肯綮的问题。两次复古思潮内在的复杂性著者辨析甚为充分, 足以立说。对抒情论的阐发, 亦深入透辟, 道时人所未见。至于文学思潮与政局的关系, 则是贯穿始终的研究思路。与著者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 崇实尚质的学术追求息息相关。

晚明卓珂月曰: “我明诗让唐, 词让宋, 曲让元, 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纽丝》之类, 为我明一绝耳。”^③民歌进入文人的视域, 而且大受推崇, 可谓晚明文学思潮的一大特色。著者注意到从李梦阳到李开先再到冯梦龙的一条文人介入民歌评论、收集、编辑、创作的线索, 惜未展开。窃以为, 晚明一批文人对民歌的激赏与拟作搜辑, 实可视为一

① 第329页。

② 第477页。

③ 《古今词统》序。

股颇有影响的文学思潮,既是市民意识观念对文人思想的渗透,亦是对复古文学思想的强烈反拨。

三、余 言

中国传统的诗文,有自己独到的表达规律,特殊的技术要求,不容易亦不适合套用西方的文学概念与话语体系来解读。但小说戏曲,尤其是白话小说,与西方的小说在文体上并无太大的扞格,那么,是否应当借鉴西方的小说理论、美学范畴来解析古代白话小说?如果应当,借鉴到什么程度?事实上,近二十多年来,已经有太多这方面的尝试之作,其中的一部分不乏文学思想史价值。比如,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就曾把唐人小说《鱼服记》与卡夫卡的《变形记》相提并论。毋庸讳言,我们自己的小说观念、小说理论毕竟单薄。还有像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对明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有无借镜,这类问题常常令我困惑,也想借此求教于宗强先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明代文学史叙述的新视角

——《剑桥中国文学史》明代部分评述

魏崇新 张洪波

自1901年翟理斯(H. A. Giles)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出版以来,用英文书写、面向西方读者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已有百余年的历史。2010年5月,孙康宜教授(Kang-i Sun Chang)与宇文所安教授(Stephen Owen)主编的两卷本《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出版,成为当今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著述的最新成果。《剑桥中国文学史》的问世为学术界所普遍关注^①,2013年6月,中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由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为中国读者与研究者带来研读的方便。《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作者皆为欧美资深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域外的学术语境与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双重影响,使他们得以从“旁观者”或曰“他者”的视角重新解读和书写中国文学史,展现出独特而鲜明的风格特点。孙康宜教授称“本书的观点和角度与目前国内学者对文学史写作的主流思考与方法有所不同”^②。用宇文所安教授的话来说即是:“我们唯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在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③这种“不在此山中”的观察、叙述中国文学史的新视角,对于我们拓展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视域以及更全面地书写中国文学史,皆具有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剑桥中国文学史》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为1375年之前的文学,由宇文所安教授主编,第二卷为1375—1949的文学,由孙康宜教授主编,本文主要讨论孙康宜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文

① 就笔者所见,关于《剑桥中国文学史》及宇文所安、孙康宜文学史观念的评述文章主要有:徐志啸《别具一格——〈剑桥中国文学史〉特色简介》,载《书屋》2010年第4期;邵燕、刘毅青《中国文学的跨文化理解——孙康宜文学史观念简析》,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李佳、曲景毅《试论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理念与呈现》,载《文化与诗学》2011年第1期;王敏《〈剑桥中国文学史〉与新文学史学》,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此外,《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两位主编孙康宜、宇文所安也在大陆报刊上撰文介绍了《剑桥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情况及其文学史观,参看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上、下)》,载《读书》2008年第5、6期。

② 《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③ 转引自蒋寅《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读书》,2005年第4期。

学史》第二卷中的明代文学部分^①，包括孙康宜教授撰写的明代初期到明代中期的文学，以及耶鲁大学吕立亭(Tina Lu)教授撰写的晚明文学部分，探讨其明代文学部分的叙述内容与特点，从中梳理孙康宜教授的中国文学史观，并由此探讨整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观。

在英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章节布局中，大多数朝代的文学只有一章的篇幅，如一向被视为重要的唐代文学也仅占一章的篇幅，占全书正文1364页的94页，占全书比重的6.8%；而明代与清代却各占两章，其中明代文学部分151页，占全书比重的11.1%，清代文学190页，占全书比重的13.9%，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剑桥中国文学史》对明清文学的关注程度。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关于明代文学的研究渐趋兴盛，呈现多元化、逐步深入的景象^②，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史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1998)、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1999、2005)中关于明代文学部分的论述，以及徐朔方、孙秋克所著《明代文学史》(2006)，皆与传统中国文学史中明代部分的论述有所不同而各出新意。《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中关于明代文学的叙述，以跨文化的视角对明代文学进行论述与阐释，与上述文学史著作对明代文学的叙述形成中西呼应。

孙康宜教授是《剑桥中国文学史》全书的主编之一兼下卷主编，同时又是明代文学部分的主要撰写者，我们讨论“明代部分”的文学史观念，主要依据孙康宜教授关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理念及其文学史观，主要见于其《新的文学史可能吗》一文以及她为中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所写的《序言》。在《新的文学史可能吗》这篇文章中，孙康宜教授说明《剑桥文学史》的读者定位是面向英语世界的大学本科层次的普通读者，并“希望这本书能够像这个系列中的其他文学史所起的功能一样，成为本科生有关东亚历史和文学课程方面的教科书^③”。“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对中国文学史做出包罗万象的综述，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年代，为具有文化教养的普通读者提供对口的读物”^④。关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表述方式，孙康宜教授称“我们希望以一种叙述性(narrative)的，也即是一种说故事的方法来处理”。希望读者像阅读小说一样，能够从头到尾畅读《剑桥中国文学史》，亦如孙康宜、宇文所安在《剑桥中国文学史》英文版序言中所说：“力求提供一个首尾连贯、可读性强的文学史叙述。”这表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风格，是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叙述语言为西方普通读者提供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背景和系统专业知识，将中国文学与文化一道展现给西方读者。这样的编写理念也决定了《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内容、视点与中国本土文学史作有所不同，它是一部普及性而非学术性的中国文学史，也不是以文学文本、尤其是文学经典文本为中心的专业性的文学史。正如孙康宜教授所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给普通读者看，又由于自身的

① 本文以三联版《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主，参照剑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 Kang-I-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关于二十世纪明代文学的研究情况，参看黄仁生《二十世纪的明代文学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③ 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引文中所说的“这个系列”即“剑桥文学史系列”，据孙教授所言，此系列此前已经出版了《剑桥俄罗斯文学史》(1989)、《剑桥意大利文学史》(1996)、《剑桥德国文学史》(1997)。

④ 孙康宜《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导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局限性,可能就不会那么注重作家个体,而会更注重一种倾向(tendency)或者一种潮流(trend)。”这种文学史编写理念或曰文学史观,孙康宜教授称之为“文学文化史”。在谈到《剑桥中国文学史》与众不同的特点时,孙康宜教授说:“首先,它尽量脱离那种将该领域机械地分为文类(genres)的做法,而采取更具整体性的文化史方法:即一种文学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①宇文所安教授则称之为“史中有史”,他认为“文学史是对以往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叙述”^②。

关于“文学文化史”的概念,孙康宜教授这样解释:“我们提出文学文化史的内在含义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很注重接受史。……另外,印刷文化(printing culture)的因素也很重要。……这对于文学史是很重要的因素。还有就是选集的选定(anthology making)也很重要,某个作家为什么在当时被人忽视?原因可能就是选集里没有他。……再就是性别问题。到目前为止,好像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中,女作家基本上被忽略,即使收入也是放在最后一个部分。”^③由此看来,“文学文化史”的内涵应包括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接受史,印刷文化书籍出版与文学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文学选集对作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影响,女性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文学与外在权力之关系等问题。“文学文化史”将文学史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包括作家与作品,而且还包括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社团、文学选集的编纂、性别写作等内容,其中的一些内容常常为以往的文学史所忽视或忽略。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剑桥中国文学史》提出将文学史放置于整个文化史的大格局中进行理解的观念,突出了文学的文化意义,也彰显了文学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使文学作为文化核心的地位得到确认。而文化也为理解支持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坐标系,让我们更能深入到文学发生的活生生场景,理解文学作为文学家和文化的心灵世界之意义。”^④以文学文化史的理念撰写中国文学史,实际上不再把文学史看作是孤立而封闭的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将文学的发展放置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之中,将文学史看作是一个对文学传统不断建构的历史过程,揭示出文学发展的多元性,凸显文学史发展中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原因,描述文学发展的整体趋势。换言之,文学文化史更重视的是对不断建构的文学史的文化生态描述。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文学史叙述的疆域,而且使文学史本身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增加了文学史厚重的文化历史内涵。

《剑桥中国文学史》明代部分充分实践了这种文学文化史观。明代部分共分两章,第一章为“明代前中期文学(1375—1572)”,第二章为“晚明文学文化(1573—1644)”。为了便于说明《剑桥中国文学史》所体现的“文学文化史”特色,我们可以将其与袁行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七编“明代文学”的章节标题相比较。袁行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明代文学”除“绪论”外共分十二章,其中以作品、作家单独成章的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汤显祖,从章节上占整个明代文学部分

① 孙康宜《剑桥中国文学史》卷首《中文版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② 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上)》,《读书》2008年第5期。

③ 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④ 邵燕、刘毅青《中国文学的跨文化理解——孙康宜文学史观念简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的半壁江山,若从篇幅上算则占有更多的叙述空间。其余的多以文体、文类分章,如杂剧、传奇、诗文等。在以文体文类为题的章节部分中,主要作家如李梦阳、王世贞、归有光、徐渭、李贽、袁宏道、钟惺和谭元春皆单独作为每节的标题,这皆说明袁行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明代文学”部分是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明代部分的章节安排则不同,两章共分为六节,没有一个章节是以作家作品为标题的,其每节的标题为:明初至1450年的文学,1450—1520;永乐朝之后的文学新变,1520—1527;中晚明之际的文学,精英形式,小说与商业精英,戏曲。每节之下设有数量不等的小标题为细目,在其所设的26个细目中,只有李贽、《金瓶梅》、冯梦龙与凌濛初、《牡丹亭》与情教4个细目以作家作品为标目,其余皆是社会文化、文学流派、文体、思潮为名,如政治迫害和文字审查、宫廷戏曲、永乐朝的台阁体文学、八股文、复古运动、苏州的复兴、贬谪文学、女性形象之重建、小说中英雄主义之改造、戏曲的改写与创新、晚明与书籍史、诗歌与职业文人、小说评注、叙事生态、作伪与崇尚真实等。以上纲目设计说明这是一部“文学文化史”,彰显出其“更注重一种倾向(tendency)或者一种潮流(trend)”的宗旨。这正如孙康宜教授所宣称的:“与上卷的原则一样,本卷的着重点不以个别作家或人物为主,而是偏于讨论当时写作形式和风格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文学多样性的追求。”^①

《剑桥中国文学史》明代部分第一章主要叙述明代专制政治、宫廷文化、科举制度、政治事件等外在权力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制约作用。例如朱元璋、朱棣父子对文人残酷的政治迫害、在文学上严厉的文字审查,以及由此造成的明初文化场景的恐怖氛围对文人的杀戮、对文学创作的摧残。比较典型的个案是高启被朱元璋腰斩对明代文学产生的负面影响,瞿佑遭受的政治迫害与《剪灯新话》叙事的当代背景。与此相比照的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产生的以歌功颂德、歌舞升平为特点的宫廷戏曲与台阁体文学,以及新科举制度所催生的八股文。作者孙康宜在叙述中重视的不是文学、文体本身的特点与审美效应,而是更加关注这些文学现象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西厢记》的论述。《西厢记》在元代文学部分“缺席”,而在明代文学部分的第一章加以论述,在第二章谈金圣叹时也有所提及,但论述的重点不是《西厢记》的文本与人物,而是其在明代的刊刻与影响。因为在作者看来,《西厢记》虽然产生在元代,但元刊本已经不存,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初的本子,这些本子已经过明人的改写,是否体现元代《西厢记》的原貌则令人怀疑。而《西厢记》在明代影响很大,有众多的刊本,明代人文参与了《西厢记》的改造与创作,典型的例子是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评改。这与第二章谈李开先对元杂剧的改造具有同样的性质,可以看出先前的文学作品在后代被赋予新解和加以创新的情况。这种情况体现了文学文本的不确定性及其动态的历史建构性,也即宇文所安教授所说的文学史叙述要做到“史中有史”。在谈到如何对文学史做一个“比较好”的叙述时,宇文所安教授说:“这样一个叙述应该讲述我们现在拥有的文本是怎么来的;应该包括那些我们知道曾经重要但已经流失的文本;应该告诉我们某些文本在什么时候、怎样以及为什么被认为是重要的;应该告诉我们文本和文学记载是如何被后人的口味与利益所塑造的。

^① 孙康宜《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导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换言之,文学史应该总是‘史中有史’的。”^①

明代部分第二章题为“晚明文学文化”,从标题即可看出本章讨论的重点是晚明文学的文化特征或曰晚明文学与晚明文化之关系。作者吕立亭比较关注的是文学发展与书籍印刷、商业消费之关系,文学创作与文人身份之变化,文学文类的流行与文学传播、印刷及读者群之关系等,简言之,在描述晚明文学产生、发展、繁荣的文学场景时,更加关注晚明文学发生的多样性文化生态环境问题。作者认为:“出版迅速发展、庞大的多样化的读者群的出现,既影响了诗歌等传统文学形式,也影响了白话短篇小说、南方戏曲等新兴文学样式。商品化不仅改变了书籍工业的轮廓面貌,而且对文学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②晚明文学与印刷出版、传播、读者之间的关系,多年来也受到大陆学者的关注,出版了一批成果^③,但这些成果尚未被转化为新的明代文学史著述。本章讨论“晚明文学文化”,其思路、内容、写法与国内的文学史有很大的差异,本章分为三部分,虽然依据的是以文类为主的方法,三部分分别谈诗文、小说、戏曲,但重点不是描述文类的文体特征、代表作家、作品及创作成就,而是从文类与作家的社会身份及文化环境之关系的角度展开叙述,比如传统诗文创作与精英文人、职业作家之关系,小说与“士商”这类“新精英阶层”之关系,戏曲与文人、演员等社会地位高低不同的成员之关系等。进而总结出晚明文学文化精英与边缘相互交集、高雅与低俗相混合的特征。

比较而言,中国本土的文学史写作非常重视文学史上经典作家与作品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文学史是以经典作家与作品为主体建构起来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明代部分的撰写则体现出“去经典化”与“去个体化”的倾向,在文学史中并没有给经典作家与作品更多的位置与篇幅,甚至有意淡化经典的地位与作用。孙康宜教授说:“相比于一般的文学史,我们还一定不会把经典化(canonization)看得那么重,像 Harold Bloom 那样,他是把个别作家看的特别重要的,所以,他说的那种经典化(canon formation),其实是把一个文学史变成了一个文学英雄的集锦(collection of literary heroes).”^④在《剑桥中国文学史》英文版序言中,孙康宜、宇文所安这样说:“中国学术界的文学史写作通常围绕作家个体展开,其他剑桥文学史作品同样如此。这部文学史不可避免地也会讨论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但是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关注历史语境和写作方式而非作家个人,除非作家的生平(不管真实与否)已经与其作品的接受融为一体。”^⑤为了避免文学史成为“文学英雄的集锦”,从而遮蔽了文学史的复杂性与多元化,在国内文学史中予以重要篇幅与地位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及重要作家汤显祖、袁宏道等,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则大幅下降,在明代文学部分的第一章中,《三国演义

① 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上)》,《读书》2008年第5、6期。

② 《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9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③ 这方面的著作有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许振东《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谢雍君《牡丹亭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④ 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⑤ 《剑桥中国文学史》卷首《英文版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经典小说仅占了其中的一个细目(小节)——“小说中英雄主义的改造”,简单地阐述了三部小说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特点。《金瓶梅》虽然也占了一个细目(小节),给予了一定的篇幅,但重点讨论的是其成书、传播及其儒家“反乌托邦”的文化内涵,全然不同于国内文学史对这几部经典的思想性、文学性的详细分析与高度评价。在“《牡丹亭》与情教”一节,重点讨论的是《牡丹亭》所反映的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情感在社会中的位置问题,以及《牡丹亭》在晚明的传播与影响。至于袁宏道,则在“诗歌与诗歌理论”一节中仅以两页英文的篇幅给予介绍。在文学经典被淡化的同时,经典的文学性也被不同程度地有意忽略。

相伴“去经典化”而来的,是《剑桥中国文学史》明代部分关于传统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明代前中期文学与晚明文学的轻重权衡与评价问题。自从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明确提出“凡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以来,同时由于现代学术界对小说戏曲这类叙事文体日趋高涨的肯定性评价,现代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似乎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思维模式,即认为在宋代之后以诗文为代表的传统抒情文学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因之在元明清文学史部分的书写中,将重要的位置与篇幅给予叙事文学,抒情文学的地位则因受到严重的挤压而相形见绌。反映到明代文学的写作中经常是重小说戏曲,轻传统诗文,重晚明文学而轻明前中期文学。孙康宜教授对此则持有不同的见解,她指出“中国学者常认为,文学上,诗兴盛于唐朝,宋朝的主要成就是词,然后是明清小说,整个文学史的发展,似乎在走下坡路,越来越弱了。闻一多就曾经说过,诗的发展到了北宋,实际上就已经完了。由于受这种文学退化论的影响,明清文学常常被忽视,所以,我们这一次也要解除这种偏见。”谈到明代前中期文学,她说:“这个时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是很重要的,被忽略的原因是中国人对抒情文学的偏见。譬如西方对抒情文学就没有这种偏见。西方有抒情、叙事、戏剧等,但抒情不是最重要的。从希腊文学来看,戏剧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文体。因此,很少有人批评说,某个文学作品不够抒情。因为抒情文学对于希腊文学来说只是其中的文学模式(mode)之一,并不是文类(genre)。但对中国人来说就不一样了,中国人拔高它,把它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对中国人来说,抒情还不仅只是一个文体(genre)而已,抒情文学成了裁定文学水平高低的一个水准。我认为这一偏见使人们忽略了明初与明中叶文学,但从文学史的观念出发,应当去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明初和明中叶出现了很多很多作品,它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狭义的抒情,但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譬如八股文。”^①基于这种认识,孙康宜教授在撰写明代前中期文学时,就用大部分篇幅叙述传统诗文以及明代的新文体八股文,并重点书写了台阁体、复古派、杨慎的贬谪文学,以沈周、祝允明、文征明、唐寅为代表的苏州文学,以及女性(才女)文学。特别是以“旧地点、新视野”为题,专门介绍了明代前中期文人写作的地域赋,如黄佐的《北京赋》、邱浚的《南溟奇甸赋》,以及董越出使朝鲜写的《朝鲜赋》、湛若水出使安南写的《交南赋》等。可见,与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相比,孙康宜教授在明代前中期文学的写作中做了不少“发现、纠偏、补白”的工作^②。在整个明代文学部分的叙述中,

① 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② 参看宁一中、段江丽《跨越中西文学的边界——孙康宜教授访谈录(上)》,《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